

# 秦都雍城布局研究\*

田亚岐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陕西 西安市 710054)

关键词:雍城遗址 考古 布局 研究

摘要:秦雍城是秦“九都八迁”过程中的一处建置时间最长的正式都城,为秦国逐渐走向强盛之里程碑。80年来取得的大量考古资料显现出这座城市所具备的多功能化要素及特征,它既体现了早期城市以自然环境作为适从条件的普遍原则,又反映出秦国面对复杂外部袭扰环境而以完备城防设施作为首选的自身特征。秦雍城由城址、秦公陵园、国人墓葬、郊外建筑及远郊“野人”聚落形成的总体格局,以及各自的摆布规律,对后代都城营建形成了借鉴作用。

KEY WORDS: Yongcheng site Archaeology Layout Research

ABSTRACT: Yongcheng, one of the Qin capitals, was used for the longest time during the migration period of “relocation the capitals night times”. This capital is also a hallmark witnessing the pinnacle to success that the Qin state achieved gradually. Archaeological works that have been conducted here after the 1980's illustrate various functions of the capital. It not only embodies the common principles that early walled-towns have to follow to adopt to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but also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 of prioritizing defensive facilities to fight against the austere external environment. The entire Yongcheng site comprises of the walled-town, mausoleums of Qin Marquises, guoren (towns-people) cemeteries, and yeren (country people) settlements. The general layout and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each section did offer lessons upon which the construction of capitals drew substantially in later period.

春秋初年,自第一代国君襄公被封诸侯之后的近六百年间,秦国历经了西犬丘(西陲)、秦邑、汧、汧渭之会、平阳、雍城、泾阳、栎阳和咸阳等多处都、城、邑,史称“九都八迁”。为实现“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子孙饮马于河”的宏大理想,秦人以包容和开放性的政治心态,横扫六合,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封建帝国。秦国辗转迁徙发展的过程,不断谋求着新的更多发展空间,从弱到强,从强到盛。如果说,当初秦国在陇东地区拉开了自身发展的历史序幕,那么后来东出陇山,向关中挺进,尤其在经过反复选择定都雍城后才有了统一六国、让子孙饮马于河的强国梦想。历史文献对雍城的记载较为简略,或先前某些考述方面还失之偏颇,所以早在上世纪20年代之前,世人对这处秦都知之甚少,而始于30年与斗鸡台同期的考古人进驻雍城,直至今日历经了工作启蒙、初期探索、全面辉煌及巩固转型等几个时期,也正是这80年来几代考古工

作者鼎力传承,才逐渐揭开了这座历史古城神秘面纱<sup>[1]</sup>。几十年来,秦雍城考古工作取得了,分布范围约51平方公里,由城址、秦公陵园、国人墓葬区和郊外秦汉建筑遗址构成的雍城文化遗存布局的轮廓伴随着考古工作深入开展而逐步清晰显现,使之成为目前全国东周时期各列国都城中保存最为完好、对其研究认识也较深入的一座,成为以都城为背景研究秦文化的重要参照。

笔者根据多年来所取得的大量考古材料,并结合文献记载,提出对秦雍城整体布局方面的初步认识。

## 一、具有完备城防优势的城内多功能体系

雍城是当时秦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位于今凤翔县城中心以南。城址南北长3300、东西宽3200米,总面积约11平方公里。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秦国崛起原因的责任伦理角度研究》(项目编号:13X2X021)阶段性成果之一。

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郑宫,卜居雍,后子孙饮马于河”。“沿雍河旁而居”是最早因为遗址本体面貌不清时人们对其位置的大致判断,当时所期望发现的也当然只是一座古城的存在可能,如最初于上世纪30年代前北平中央研究院学者在发掘宝鸡斗鸡台“瓦鬲墓”期间,因驻扎于当时的府城凤翔,曾沿雍水河畔探寻文献上所说的秦雍城<sup>[2]</sup>;自上世纪50年代起,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渭水队和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先后将雍城列为渭水流域重要的考古调查目标,这一工作时段所关注的目标仍然是寻找“城”,但是由于时隔两千五、六百年之后,地面上有关城的踪迹几乎荡然无存,加之当时秦文化考古工作刚刚开始,有关遗存的内涵特征、遗址面貌并不为人所了解,所以在初次见到古代城墙和建筑材料之后,自然把位于雍水河沿岸的“南古城”与“西古城”作为秦雍城的宫城所在<sup>[3]</sup>。其现在看来,上述两地虽位于今天已确认的秦雍城遗址范围之内,其中也包含着东周时期的遗物,但其主要文化遗存从时代上讲并不是东周时期,当然就不具备秦雍城宫城的属性,判断它可能系西汉时期雍县县邑或者同期官署一类建筑。当时也在南古城村周边做过小范围的调查,发现了有关秦雍城的遗存迹象<sup>[4]</sup>,前贤在这一时期历经了艰难困苦的创业期,也为嗣后以“南古城”河雍水河为基本坐标而继续寻找雍城城址铺垫了坚实的基础。上世纪70年代秦雍城大规模考古工作延续,这一时期由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主导,在前人的基础上对雍城城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钻探和发掘,初步摸清了雍城的位置、规模;提出了城内存在三大宫殿区的基本判断,在此基础上发现并发掘了西城墙遗迹、马家庄秦宗庙遗址、朝寝建筑遗址和姚家岗凌阴遗址等,这一时期在秦雍城遗址范围内获得的丰富标识性考古材料与认识,使秦雍城城址区的格局开始显现出来<sup>[5]</sup>。本世纪以来,按照新时期大遗址考古工作的总体要求,根据秦雍城的具体现状,尤其参照了既往“宏观”所取得的考古工作成就,确立了“微观”工作以“进一步准确了解该遗址的范围、总体布局、各遗迹位置、内涵性质与结构、历史沿革、保存状况”的思路,这一时期对城址区全面调查取得了突破性认识,布局已基本清晰显

现,性质明确的相关遗迹如城市道路、宫殿建筑、聚落、作坊、环境因素等,使城内各功能区的空间摆布展现出这座秦都城所具备的典型性特征<sup>[6]</sup>。

目前对雍城城址范围和四至基本确定,其主要的遗迹标识为周边残断的城墙以及与之相关联的自然环境如地貌、河流等。

秦国早期不断迁徙都邑的主要原因是摆脱来自外部的军事袭扰,以寻找安全的生存与发展空间,所以雍城地理环境符合秦国择都的首选条件及要求,这也是自秦宪公、武公两代国君在平阳短暂停留之后,德公迁都雍城的主要缘由。考古工作至今没有发现战国以前秦城有修筑城墙的实例,有学者曾提出从秦公陵园兆沟的发现中推断当时是以大河、沟壑作为城周环护设施的观点,后来实际考古工作逐步证明这种认识是符合情理的。通过最新考古调查发现<sup>[7]</sup>,初期雍城外圍分别以四周的雍水河、纸坊河、塔寺河以及凤凰泉河环围。由于当时的河水丰沛,河谷纵深,自然河流便成为“以水御敌于城外”的主要城防设施。这种情形与甘肃礼县大堡子山、圆顶子山秦西犬丘城的防御体系如出一辙,这当是文献所说“城堑河濒”,即以水围城,并将临水的河谷挖深,使河堤陡直、河岸增高以加强城防安全系数,同时堑于河内的泥土堆积于岸边也起到抵挡河水上岸的作用。

战国时期,形势突变,列国并存,群雄争霸,战争频仍,攻伐谋略上升,为了适应新的形势,秦国在原“以水御敌”基础上再构筑了城墙及相关辅助设施。上世纪80年代初对城址进行考古调查与勘探时,经解剖证实早年所发现的南北向夯土墙基为雍城西城墙北段的一部分,同时又新发现了属于雍城东、南、西、北四边城墙的残段遗存,初步确认了雍城城墙的基本走向。西墙目前保存较好,南墙沿雍水河方向修筑,蜿蜒曲折东墙紧依纸坊河,北垣大部为今县城所压,仅在今凤翔县城内发现部分墙体遗迹残断<sup>[8]</sup>。雍城城外除东、南以纸坊河、雍水等自然河流为天然屏障外,还在西墙外侧开掘了人工城壕作为防御设施的一部分,以补充因该区域雍水河面宽阔、河堤较浅而防御性较弱的不足。关于城墙的确切走向与结构,据最新大遗址考古调查结果,经过

对已知各城墙遗迹点的梳理与拼合连接,合围成不规则梯形,与早年的认识基本吻合。经解剖性勘探,城墙墙体宽度为8~14米不等,其构筑方法则为中、里、外三重分别建造。在墙体夯土层内发现秦雍城初期陶片,以此推断如《史记·秦本纪》“悼公二年,城雍”记载的可靠性,即秦国在都雍城近二百年之后才正式构筑城墙。在修筑的城墙里侧一周,因筑墙取土所形成的与城墙走向平行的沟壕,与城墙形成了多重防御屏障。

通过对城址及其周边地理环境考察,发现城内布局顺应了当时的自然环境。由于雍城西北高,东南低,加之从北部雍山一带的水流通过白起河及多条河流穿城而过,使当时的雍城成为“水”中之城,从而形成了当时城内布局“顺河而建,沿河而居”的情景。河流成为当时城内便捷的水上通道,河堤沿岸往往有临河道路,同时城内各条道路纵横交错又相互连接。调查发现当时临河而建的聚落形成多个相对集中的片区,沿河而居则方便地利用了向河中自然排洪的功能,同时通过地下引水管网将河水引向城中各个区间,用作诸如作坊生产、聚落生活以及苑囿池沼用水等。对一座具有多功能的秦都城来说,道路与街区是其基本骨架,它是一座城市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明确了道路系统,对于厘清整个城市布局至关重要。上世纪有学者曾做过初期工作,并提出“四纵四横”的观点<sup>[9]</sup>,但遗憾的是缺乏地层学与类型学的比对数据,因为在城址范围内曾有历代沿革,各时代道路错乱叠压,而从中梳理出真正属于秦雍城时期的路况信息才是解决问题之关键。近年在相关发掘中对此问题的探讨终于获得一些重要的信息,当时在秦雍城城址北部共发掘出6处古代道路遗迹,这几段古代道路分别处在不同的层位下,按历年来在雍城遗址确立的地层年代关系,压在②层下即为明清时期的道路,路面宽4~5米,路土中包含瓷片及明清时期砖瓦碎片等;压在③层下即为唐宋时期的道路,路面宽3~4米,路土中包含同期瓷片、砖瓦等;压在④层下即为汉代道路,路面宽18~21米,路土中包含东周时期瓦片、西汉时期砖瓦碎片等;而压在⑤层以下,生土之上的即为雍城时期道路,路面宽9~11米。虽然当年将发现的道路信息几乎都排除在雍城道路之外,但却对随后

针对秦雍城时期道路开展工作提供了明晰的指向和参照<sup>[10]</sup>。近年对秦雍城道路系统做专门调查时发现,因城市布局“顺河而建,沿河而居”的特点,道路也往往形成“顺河而设”的走向与格局,不过还有各功能区间的互通道路,尽管不临河,也仍然是城内的道路系统组成部分,越河的地方应该存在搭建的木桥。

整合历年来雍城城址考古调查资料,发现具有大型宫室结构的遗迹至少有三处,即最早发现的马家庄三号建筑遗址,也称“朝寝”遗址,因其与东侧的秦宗庙遗址成东西并列,符合“左祖右社”的制度。关于其性质,据《仪礼·释宫》之解释:“周礼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宫南乡而庙居左,庙在寝东也。”韩伟先生在《秦公朝寝钻探图考释》一文中,对马家庄三号建筑群各部位名称进行了推定,对各门及有关建筑的形制、功能进行了探讨。认为马家庄三号建筑的五个院落即为五重曲城,五个门庭即所谓皋、库、雉、应、路五门,并以此证实先秦时代的天子五门制度及秦公的僭越行为。韩伟先生同时还考证外、治、燕三朝的位置及功能等,该建筑群的年代为春秋中晚期<sup>[11]</sup>。与三号建筑遗址成为组合关系的为一号建筑被确认为秦宗庙遗址,这是目前经考古发掘确认的唯一保存完好且与先秦文献记载吻合的礼制建筑<sup>[12]</sup>,因此这一区域也被列为马家庄宫区;在马家庄宫区的临近西侧的姚家岗村东,因为早年也曾发现过与马家庄同期的建筑遗址、凌阴遗址和铜质建材构件窖藏遗迹,所以将其列为另一宫区,即姚家岗宫区。经近年来进一步调查,姚家岗的上述遗迹其实系马家庄宫区的组成部分,除此之外在姚家岗发现的其它遗迹则时代较晚,且不存在像马家庄一样的多进院落的宫室,当然不能单独成为宫区。最近对城址区进行大规模调查时,在城址区的东南瓦窑头村一带发现了一处有多进院落结构特征的大型宫室建筑,该建筑残长186米,有“五门”、“五院”、“前朝后寝”的格局<sup>[13]</sup>,与马家庄朝寝建筑外形相似,但结构更复杂,又与岐山凤雏村宗庙遗址四合院式的组合相类同<sup>[14]</sup>。根据文献记载及参阅相关研究,这组建筑由外及里可释为五门、五院。有屏、门房、厢房、前殿、大殿、寝殿、回廊、偏厢房、阶、碑、阙等建筑单元。从所处区域地层堆积及

采集建筑板瓦、筒瓦判断,该组遗址应早于马家庄朝寝建筑,而晚于岐山凤雏村西周宗庙建筑遗址的年代,属雍城早期宫室建筑。这一发现初步显现出秦早期传承周制的寝庙合一组合模式。按照秦国庙寝制度的演变趋势,从春秋寝庙合一发展到春秋中晚期庙寝分开并列,再演变到战国以后为突出天子之威,朝寝于国都中心,将宗庙置于南郊的情形。过去在雍城城址北部的铁丰、高王寺一带也曾发现过一处多进院落建筑,因位于今县城在建区,未得以完整保存。从采集的建筑材料如槽形板瓦、筒瓦、虎雁纹瓦当和战国铜器窖藏出土的镶嵌燕射壶、敦、盖豆、盘、匜、提梁壶、甗等观察,推断其时代当为战国中晚期,这当是雍城作为都城后期宫区所在。上述三大宫区的发现说明雍城置都的三百年期间曾存在拆迁异地改建宫室的过程,这一发现为探讨秦国城市最高礼制建筑的渊源、传承与发展脉络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从三者的早晚关系看,瓦窑头一带系目前雍城营建最早宫区建筑,之后是位于其西北方向的马家庄宫区,最后则是位于最北端的铁丰——高王寺宫区,从这一情况分析,雍城的城市规模是从东南部逐渐向北、西北部扩大的。

据目前正在进行的马家庄及周边区域“微观”性考古调查与勘探,已在原先基础上有较多新的发现,待材料公布之后,将会对域内宫区布局产生更新的认识。

历次考古调查均发现,在上述每一处宫区范围内都存在另外两个层次的建筑,一类是较大型的建筑,有夯土基础和大量陶质建筑材料;另一类则是较为密集的聚落型建筑,或为中小型地面居室建筑,或为半地穴居室结构,这些与宫室形成单元性组合体系。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郑宫”,又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后附《秦记》:“康公享国十二年,居雍太寝;共公享国五年,居雍高寝;景公享国四十年,居雍高寝”;“桓公享国二十七年,居雍高寝”;“躁公享国十四年,居雍受寝”。在雍城城址范围内目前发现时代与文献吻合的三处宫室可能是上述记载中的三个“寝”,即瓦窑头为康公所居之高寝,那么康公之前的德公、宣公、成公、穆公也当居于此宫;马家庄即为自桓公前后若干代秦公所居之雍太寝;铁丰——高王寺为躁公前后若干代秦

公所居之雍受寝。按此推断,若大型建筑与寝宫有关,系秦国王权中心,为秦公所居,那么中型建筑或为国家官署和贵族居室,小型建筑或为国人居所。这种等级建筑组合反映出当时城内所居者当包括秦国国君、秦国贵族和所有阶层的“国人”。传统的观点认为城内仅为王者所居,平民当居于城外,然多年在城外却始终未见“国人”所居的踪迹,只见其死后葬身的墓地而已。通过此次发现对秦都城内有“国人”所居的观点提供了依据,也为当时秦国社会组织结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作坊是都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次考古调查先后于雍城城墙内外发现各种手工业作坊多处,如在史家河、马家庄和今凤翔县城北街一带发现青铜作坊遗迹的线索;炼铁作坊在史家河、东社、高庄一带;制陶作坊发现于城内豆腐村、铁丰、瓦窑头以及雍城城外的姚家小村、八旗屯等地;陶制生活用器则发现于邓家崖东岗子一带。作坊一般分布于四周城墙的内侧,作坊临近的小型建筑可能为工匠族系所居。在“城堑河濒”的内侧,但却属于城墙外侧的城边一带,曾发现多处如邓家崖、瓦窑头国人墓地,而且墓葬往往打破作坊遗址,这说明当初选择都城时河的内侧即为城内,作坊布局于此,当后来正式修筑城墙时将边角区域置于墙外,这里自然又变为城外之地,作坊随之弃用,而改作城墙外侧国人墓地之用。与此相反的是,在城址北区发现的如雷家台、翟家寺等地小型秦墓葬的时代却早于该处的建筑遗存,推断这里之前也为城外,是后来扩大城市规模时才将其纳入城市新区范围,而墓葬区在建城之前业已形成。

在城址区范围内,各聚落之间形成广阔的空隙,其间除道路遗迹外,没有发现雍城时期的人群居住、作坊或其它活动遗迹,推断其用途当为农田区域。从环境角度考察,当时雍城城外广袤的郊野虽土地肥沃,却是苑囿之地,而粮食支撑可能来自城内宽阔的土地,这种情形在当时战事紧张时显得尤为重要。雍城城外及穿越城内的多条河流,提供了丰沛的水资源,也使当时的雍城成为一座水上之城,加上城外植被茂密的林区环境,为雍城提供了富实的渔猎经济,这种多元性经济结构壮大了秦国国家实力,成就了秦国在

雍城蓄势之后继续东扩的愿望。

随着对雍城城址的全面调查,过去对一些文化遗存的传统认识也发生变化。诸如早年在城址北部的高王寺村西经考古调查勘探发现一近似于长方形的封闭空间,四周为夯墙,四周墙上有门,面积达3万平方米左右。有学者根据《周礼·考工记》所记载的“前朝后市”的布局原则,并结合出土战国早期至秦汉之际文物标本,初步推断为当时的“市场”<sup>[15]</sup>。根据近几年城址调查结果,当初所谓“前朝后市”的位置关系是因其在马家庄宫室的北侧而得出的结论,但是两者的年代一早一晚,难以对应。如果依据文献记载将其看做三大宫区中躁公时的“受寝”组成部分则较为符合情理,而各宫区所谓“后市”当在各自自主宫殿建筑的北侧近距离处。再如今凤翔城内毡匠巷的“秦穆公坟”遗址,曾因清代毕沅根据讹传而写题额得名,这是近于方形的高大夯土台,出土有红烧土、路土、凹字形板瓦、筒瓦等,经近期调查确认,该遗址实际上不是墓葬,更不是“秦穆公坟”,它原本可能系北垣之上墙垛结构,或者为城墙临近的城内高台建筑,其结构系夯筑,为正方体的内收多级台阶,已知四面底座边长均为38米,“城内建立突出的土台基址,成为我国春秋战国时期都城的重要建筑特征”<sup>[16]</sup>,土台的用途可能与文献中秦国国君登高瞭望、迎见礼仪用途有关。还有像城址北部的“三良塚”遗迹,传为秦穆公时期的臣僚之墓,经重新考证后也当为晚代墓葬。

在今凤翔城以北的小沙凹村曾出土楚国宗庙之器,这里可能是秦国举迁楚国贵族在雍城城外居住的佐证<sup>[17]</sup>。

## 二、规模恢弘且承前启后的秦公陵寝

雍城南郊三畹塬上的雍城秦公陵园是目前所知最大的秦国国君陵寝之地,自秦穆公起当有多位秦国国君葬于此。陵园不仅是秦公的安享之所,同时因其优美的自然环境而成为秦国贵族缅怀祭祖、教习骑射与围猎之场地。自上世纪80年代起至上世纪末,对雍城秦公陵园经历了三次大规模勘探与发掘<sup>[18]</sup>。目前已钻探出的51座大墓,平面形制可分为丰字形、中字形、甲字

形、凸字形、刀把形、目字形、圆形等七个类型,其中丰字形、中字形和甲字形为大墓,其余形制皆为外藏坑。根据陵园内的兆沟布局,可将目前勘探出的结果分为14座分陵园,每座分陵园由数量不等和类型不同的大墓组成。整个陵区应被一个外围兆沟圈起,其内侧两重兆沟可分为双兆形(即以内兆环围主墓墓室,中兆环围主墓及车马坑)、单兆形(即中兆环围主墓及车马坑,不设中兆沟)、组合型(即多个陵园共用中兆或陵园中包含着另外一座陵园)<sup>[19]</sup>。雍城秦公陵园为“平地起坟,不封不树”,主墓墓上有建筑及享堂。陵园大多坐西朝东,仅十四号陵园坐北向南。1座丰字形和20座中字形大墓作为陵园内主墓居于各分陵园的右或中部,3座甲字形、1座刀把形大墓作为附葬墓依次排列在左下方,8座凸字形、18座目字形车马坑排列在右前方。与其它先秦诸陵园相比,雍城秦公陵园不仅规模宏大,而且布局规整,它与之前和后来的秦陵园形成了具有持久性、继承性、完整性、独特性的秦国陵园体系,其反映了秦陵园从集中公墓制即所有墓葬均集中于规划的陵区之内,向着独立陵园制及各陵园以兆沟相互隔开的发展过程<sup>[20]</sup>。

秦公一号大墓系目前在雍城秦公陵园内唯一被发掘的墓葬实例,成为直观了解秦公陵园性质与内涵的典型材料。该墓平面为中字形,坐西向东,全长300、深24米。墓室由主椁室、副椁室、箱殉72具、匣殉94具等组成。该墓虽屡经严重盗扰,但仍出土铜、铁、金、陶、玉、漆器及纺织品等各类文物三千余件。根据墓中出土的石磬刻文,基本确定大墓的墓主为春秋晚期的秦景公。椁室中南北两壁由带有榫头的柏木椁板组成长方形箱式主椁,初步认为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套“黄肠题凑”葬具,大量的殉人与殉牲、用于助葬的木质“墓碑”等对于研究秦国国君丧葬礼仪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在秦公一号大墓东南方向为凸字形车马坑,系同期埋藏的外藏坑,在西墓道南侧曾发掘出属于大墓的车马与人牲祭祀坑<sup>[21]</sup>。

在传统认识基础上进一步以“微观”方法对雍城秦公陵园进行细部调查与勘探工作,是新时期雍城大遗址考古工作目标之一,工作初期曾尝试随机选择14座秦公陵园中的一、六号陵园进

行实验性复探,最终结果在一号陵园中兆沟紧邻外侧东北方向新发现 446 座同期或年代晚于该陵园的中小型墓葬,其中“目”字形中型墓葬 9 座,其余 437 座为小型墓葬,没有发现环绕小墓周边的兆沟;之后又在六号陵园发现与一号陵园具有相同规律,也在园中兆沟紧邻外侧西南方向的 703 座同期或年代晚于该陵园的中小型墓葬,其中“目”字形中型墓葬多达 29 座,其余 674 座为小型墓葬,同样没有发现这群中小型秦墓周边的兆沟。随后为确认环绕在秦公陵园兆沟外侧中小型墓葬的布局、性质、年代及沿革情况,又对六号陵园中兆沟外侧的 5 座中小型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虽然所发掘对象均遭严重盗扰,但从布局关系上表明在中型墓葬的东南方必有一座陪葬车马坑存在,根据对秦墓葬层次结构的传统认识,以单一车马坑陪葬是秦国贵族墓葬的显著标志,而发掘出的中型墓葬与车马坑主人的较高等级身份说明在整个墓群中包括少数贵族墓和大批平民墓葬。从出土的茧形壶、陶盂、陶罐器形上判断为战国早期。再从整个中小型墓区分析,战国早期可能是它的上线,群内还有少数偏洞室与直线洞室墓存在,说明该墓地沿用时间较长,可能延续到战国末期<sup>[22]</sup>。

通过这两座陵园选择性复探,在传统基础上对雍城秦公陵园有了新的认识:首先,由于在陵园中未发现新的“中”字形秦公大墓,说明在整个雍城已发现的 21 座“中”字形大墓数基本与当时在雍城执政的秦公人数相吻合或超出,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中字形大墓可能为秦公陵墓的判断,对于目前在整个雍城秦公陵园内仅发现的 3 座甲字形大墓,从陵园制度的规律性讲,过去认为此类墓系秦公夫人墓的观点从情理上讲较为牵强,认为是未享国的太子墓的观点似有可能。其次,基于最新的陵园复探结果,既往在陵园兆沟之内往往被通称为大墓的遗迹,除“中”字形和“甲”字形为陵墓外,其它形制的则不是墓葬,而分别为秦公陵园的车马坑与祭祀坑,这就说明当时在秦公陵园的兆沟之内埋葬的墓主人可能只有享国的秦公或未享国的太子。那么秦公与夫人是合葬还是同茔异穴?秦国宗室贵族、军功大臣又葬于何处?如果夫人、宗室贵族、军功大臣不葬于中兆沟之内,那么应该就在中兆沟

之外的中小型墓群内。根据整个秦公陵园布局,这些墓群被陵园外兆沟所包围,从布局上来看必然与陵园有关系。根据目前掌握的考古材料推测,他们若不是以从死从葬的身份葬于秦公大墓之内,就有可能葬于兆沟以外的中小型墓群。再次,过去认为秦公陵园是“公墓”,而国人墓地为“族墓”,二者属性不同,相互分开。从新发现看,整个雍城秦公陵园如西村、立卜务、黄家庄等“族墓地”,均可能与秦公陵园呈现组合关系,这些墓地靠近陵园,可能是秦公或大臣的族人。

未来大规模“微观”性的考古工作可能会发现更多新材料,使我们对雍城秦公陵园的认识更加深入,诸如在南指挥和三岔这两个陵区之间的工作空白区间,目前通过田野调查发现兆沟迹象,倘若再发现更多的陵园和大墓,那么大墓数更多地超出了雍城执政的秦公人数,那么对大墓墓主身份将重新界定,因为当时实行“一公一陵”、秦公夫妇同茔异穴似乎更加合理。

文献中秦国墓葬制度当体现“事死如生”的理念,秦以西为上尊方位,雍城秦公陵园内各分陵园之间的摆布是否显现这一特征<sup>[23]</sup>。同时在宗庙内秦君是按照昭穆之制排列的,那么陵园内是否也存在同样的位置关系,这是今后要继续关注的问题<sup>[24]</sup>。

### 三、环城四周聚族相葬的国人墓地

对国人墓葬的发掘开启了早先对雍城的直观认识和研究秦文化的大门。雍城周边千余座东周秦墓系统地反映了从春秋早期到秦代 500 多年间秦人埋葬习俗的演变过程,以及呈现多元化特征的社会组织结构变迁,国人墓葬出土大量对时代敏感的陶器,成为秦文化分期的重要参照。

既往在雍城发现的国人秦墓均分布于南郊的雍水河畔,如八旗屯春秋墓群<sup>[25]</sup>、高庄战国至秦代墓群<sup>[26]</sup>、西村战国墓群<sup>[27]</sup>、南指挥墓群<sup>[28]</sup>、上郭店墓地<sup>[29]</sup>、黄家庄墓地<sup>[30]</sup>以及孙家南头春秋秦墓群<sup>[31]</sup>。当时这一区域被认为是雍城国人墓葬唯一分布区<sup>[32]</sup>。

近年来考古调查与发掘则显示出国人墓地

环绕在秦雍城城址周边的整体分布规律,或者墓葬与城内聚落之间在布局上存在的某些对应关系,改变了过去认为国人墓地仅在城南雍水河两岸分布的传统观点。

经类型学比较,处在雍水河以南的国人墓地如八旗屯、高庄、西村以及南指挥陵区、六号陵园兆沟外侧墓群等均呈现规模大、延续时间长、墓葬间层次结构区分明显、各墓地之间墓葬特征统一相近的特点。这些墓地靠近陵园或在已知陵区之内,墓主人包括官吏、贵族和族系成员,从人口数量和族系规模上讲是秦国社会主流;而址城周边国人墓地如邓家崖<sup>[33]</sup>、六道村<sup>[34]</sup>、瓦窑头、雷家台等均呈现规模小、延续时间短、层次结构区分不明显、文化属性单一、各墓地之间墓葬特征殊异的特点,如位于东墙外六道村墓地均为无随葬器物的偏洞室屈肢葬墓,而位于西城墙一带的则是随葬少量不成组合关系陶器的浅竖穴墓葬,而城北田家庄秦墓则是目前在雍城郊外最远距离所发现的秦国国人墓葬,仅随葬泥器<sup>[35]</sup>。上述墓地从分布状况显现出“聚族相葬”的特征,这些墓地往往分别靠近城边的作坊区,墓地成员生前可能从事相应的手工业生产活动。

#### 四、体现雍城完整布局与功能的郊外建筑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除城内宫室之外,雍城时期秦国诸多重要礼仪活动要在城郊举行,不同的礼仪活动在相应的地点,由于是固定场所,所以必有建筑存在,其大多分布于近郊地区,如考古发现的“年宫”、“橐泉宫”瓦当和不知宫名称谓的南郊三岔建筑遗址、西郊塔陵村战国宫殿建筑遗址和西南郊六塚村战国建筑遗址等,还有如“蕲年宫”则置于郊外距离更远一点的地方。后来随着秦都城的东迁,原宫城与近郊建筑已弃之不用,而雍城仍作为一座“圣城”,秦汉时期的诸多重大礼仪活动仍然要在这里举行,如秦始皇登基时的加冕典礼,汉武帝之前的西汉多位皇帝亲临雍城的郊祀活动等,于是在原“蕲年宫”的基础上修葺了多宫在一起的“群宫”象征建筑,在孙家南头村同一建筑遗址上就发现“蕲年宫”、“来谷宫”、“橐泉宫”、“竹泉宫”多个文字瓦当,其目的可能是考虑到皇帝每年只来一次雍城的活动

中,尽量在一地或邻近地方完成所有的祭祀程序。在该组建筑遗址附近还发现“羽阳宫”文字瓦当与“汧共(供)厨”祭器等,在城西约20公里的雍山血池一带新发现一处西汉建筑遗址,推断可能与文献所记汉高祖刘邦的雍北畤有关。除此之外,城东凹里村的秦汉时期建筑遗址当是通往雍地的东西交通道路上的行宫;孙家南头仓储建筑遗址系西汉大型漕运仓储建筑基址,可能就是瓦当所指的“百万石仓”。该建筑遗址所在地也发现东周时期同属性建筑,判断秦国当时的仓储码头也在此地,由此推断秦穆公时期秦国将大量的粮食装船运往晋国的“泛舟之役”起点即在这里,这虽与郊外礼仪建筑无关,但它为雍城郊外交通口岸的布设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sup>[36]</sup>。

#### 五、余论

作为东周时期秦国“九都八迁”历程中置都时间最长、规模最大、保存较好的一处正式都城,从“都、城、邑”的功能与层次结构比较,雍城达到具备正式都城的条件,而且后来随着秦都东迁,这里作为一处古城“圣都”的影响直至汉武帝时期,成为“汉承秦制”的历史典范。

据《尔雅·释宫》:“都者,国君所居,任所都会也”。以量化的标准,秦都雍城所具备的条件:国君驻地,为国家王道之象征;设宗庙,系先王之主,是国家根基之象征;较多聚落与人口,凸显“人所聚会”之优势;有城墙、宫室与大型建筑,是国家政权的标志;有觐见礼仪与朝贺之礼,是与东方六国平等礼遇的标志;有秦公陵园,是秦公“事死如生”的安享之地;有各类作坊,是国家发展的前提;有广阔土地,是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雍城置都时期,历经三百余年,顺应时势,完成了从以血缘为纽带的封国到王国的过渡,并开启了以地缘政治为特征的帝国发展之路。

据《管子·乘马》:“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房省。因天才,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按照秦国“都、城、邑”东迁路径,雍城数第六处,之前每个地方停留时间不长久,究其原因是由于外部环境造成其生存空间压

抑,具体表现在西戎的袭扰与本身土地与人口资源环境的不足。为寻找安稳的发展空间,战略防御功能就显得至关重要,在此背景下秦人选择了雍城,“城塹河濒”的战略防御优势与良好的环境资源营造了这里作为长久之都的可靠条件,秦国在此得以蓄势发展,为东进战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雍城的自然环境支撑了其战略防御的主要需求,此前提下的其他要素则居于次要位置,所以秦人没有苛求于环境上的不足,而是顺应自然,形成“沿河而居,顺水而建”的城市格局,此当为后世之借鉴。

雍城城内主宫殿区的分布较为清楚,建筑朝向为坐北向南,目前对整个城市的朝向判断有坐西向东、坐北向南两种说法<sup>[37]</sup>。从对雍城道路考古调查情况分析,城东、西、南三面均有城门,北门不清楚,根据出城主路径分析,主门当在南,这样也正好与秦公陵区的北门互通,基于这一点,笔者赞同坐北朝南说。

据《吴越春秋》:“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卫民”。秦雍城初期营建是从南部逐渐向北推移与扩建,城市规划布局当在秦悼公“城雍”之后才走向成熟。城以墙为界,城内当至少有内城区和外城区之别,内城为城,为朝宫、官署和贵族所居,外城为郭,为国人所居。雍城时期,各列国城郭形态虽存在形式上的差异,但其共同具有的大城、小城则普遍存在。如两城连接、多城连接、内外套合与单一城圈内附属设施等<sup>[38]</sup>。从最新雍城城址考古调查结果分析,除早期东南角宫区外,后期城内各聚落区的高等级建筑偏于城的里侧,而较低等级人群居住区则贴近城墙近距离处,其间正好被修筑城墙取土所形成的沟道分隔,似乎也有内、外城功能之分,冀望于未来更多的考古材料对此有权威性的再解读。

- [1] a. 韩伟,焦南峰. 秦都雍城考古工作综述[J]. 考古与文物, 1988(5,6合刊). b.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汉研究部. 陕西秦汉考古工作五十年综述[J]. 考古与文物, 2008(6). c. 田亚岐. 秦雍城考古工作回顾与展望[C]//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院刊(总第二辑). 西安:三秦出版社, 2012(8).
- [2] 同[1]:c.
- [3] a. 考古研究所渭水调查发掘队. 陕西渭水流域调查简报[J]. 考古, 1959(11). b. 陕西考古所渭水队. 陕西凤翔, 兴平两县

- 考古调查简报[J]. 考古, 1960(3). c. 陕西省考古所凤翔发掘队. 陕西凤翔南古城遗址试掘记[J]. 考古, 1962(9).
- [4] 陕西省考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凤翔队. 秦都雍城遗址勘查[J]. 考古, 1963(8).
- [5] a.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晋. 凤翔南古城遗址钻探与试掘[J]. 考古与文物, 1980(4). b. 陕西省雍城考古队. 秦都雍城遗址勘探试掘简报[J]. 考古与文物, 1985(2). c. 凤翔县文化馆, 陕西省文管会. 凤翔先秦宫殿试掘及其铜质建筑构件[J]. 考古, 1976(2). d. 陕西省雍城考古队. 陕西省凤翔春秋秦国凌阴遗址发掘简报[J]. 文物, 1978(3). e. 凤翔县文化馆, 陕西省文管会. 凤翔先秦宫殿试掘及其铜质建筑构件[J]. 考古, 1976(2). f. 陕西省雍城考古队. 陕西凤翔春秋秦国凌阴遗址发掘简报[J]. 文物, 1978(3). g. 陕西省雍城考古队. 凤翔马家庄春秋秦一号建筑遗址第一次发掘简报[J]. 考古与文物, 1982(5). h. 陕西省雍城考古队. 凤翔马家庄一号建筑群遗址发掘简报[J]. 文物, 1985(2). i. 尚志儒, 赵丛苍. 《凤翔马家庄一号建筑群遗址发掘简报》修正[J]. 文博, 1986(1). j. 陕西省雍城考古队. 一九八二年凤翔雍城秦汉遗址调查简报[J]. 考古与文物, 1984(2). k. 韩伟, 曹明璋. 陕西凤翔高王寺战国铜器窖藏[J]. 文物, 1981(1). l. 焦南峰, 马振智. 蕲年、穰阳、年官考[J]. 考古与文物(丛刊第三号), 1983(11). m. 韩伟. 揭开秦都雍城神秘的面纱[C]//陕西省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编. 陕西60年重大考古重要发现亲历记. 西安:三秦出版社, 2010(12).
- [6] 田亚岐. 从传统“宏观”到现今“微观”工作的接力与尝试——秦雍城遗址“十一·五”考古保护工作收获[C]//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 陕西“十一·五”期间大遗址考古重要发现. 西安:三秦出版社, 2012.
- [7] a.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秦雍城城址区考古调查勘探年度工作报告(2012)[M]. 待版. b. 田亚岐. 秦雍城城址东区考古调查取得重要收获[C]//国家文物局编. 2012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3. c. 杨永林, 张哲浩. 陕西秦雍城“微观”考古新发现“城塹河濒”实景[N]. 光明日报, 2013-1-8(9).
- [8] 陕西省雍城考古队. 秦都雍城遗址勘探试掘简报[J]. 考古与文物, 1985(2).
- [9] a. 秦都雍城发现市场和街道遗址[N]. 人民日报, 1986-5-21(3). b. 王学理等. 秦物质文化史[M]. 西安:三秦出版社, 1994. c. 尚志儒. 秦都雍城的总体布局与考古发掘[N]. 中国文物报, 1990-6-28.
- [10] 田亚岐等. 秦雍城道路与排水系统考古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N]. 中国文物报, 2011-12-19. 田亚岐等. 秦雍城道路与排水系统考古工作[C]//国家文物局编. 2011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2.
- [11] 韩伟. 秦公朝寝钻探图考释[J]. 考古与文物, 1985(2).
- [12] a. 韩伟. 马家庄秦宗庙建筑制度研究[J]. 文物, 1985(2). b. 徐杨杰. 马家庄秦宗庙遗址的文献学意义[J]. 文博, 1990(5). c. 滕铭予. 秦雍城马家庄宗庙遗址祭祀遗存的再探讨[J]. 华夏考古, 2003(3).
- [13] 同[7]:a.



- [14]周原考古队. 陕西岐山凤雏西周建筑遗址发掘简报[J]. 文物, 1979(10).
- [15]同[9]: a.
- [16]杨鸿勋. 从盘龙城商代宫殿遗址谈中国宫廷建筑发现几个问题[J]. 文物, 1976(2).
- [17]陕西省文物局编. 陕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丛书: 宝鸡卷(凤翔文物)[M]. 西安: 陕西旅游出版社, 2012.
- [18]a. 韩伟. 陕西凤翔秦公陵园钻探简报[J]. 文物, 1983(7); b. 陕西省雍城考古队. 陕西凤翔秦公陵园第二次钻探简报[J]. 文物, 1986(5). c. 焦南峰, 王保平, 田亚岐, 景宏伟. 陕西凤翔秦公 14 号陵园钻探简报[J]. 考古与文物, 待刊.
- [19]同[18]: b.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汉研究室编. 秦物质文化史[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94.
- [20]赵化成, 高崇文. 战国秦汉考古[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0.
- [21]宝鸡先秦陵园博物馆编. 雍城秦公一号大墓[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0.
- [22]田亚岐等. 陕西凤翔雍城秦公陵园[C]// 国家文物局编. 2009 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9.
- [23]田亚岐. 雍城秦公陵园诸公墓主考识[C]//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 咸阳师范学院编. 秦汉研究(第二集).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7.
- [24]a. 徐卫民. 秦公帝王陵园考论[J]. 文博, 1999(2). b. 石兴邦. 秦代都城和陵墓的建制及其历史意义[C]// 咸阳博物馆编. 秦汉研究. 1990. c. 马振智. 试论秦国陵寝制度的特点[J]. 宝鸡师院学报, 1989(1). d. 马振智. 试论秦国陵寝制度的形成与发展[J]. 考古与文物, 1989(5). e. 刘士莪, 马振智. 秦国陵寝制度对西汉帝陵制度的影响[J]. 文博, 1990(5). f. 马振智. 秦国陵区考述[C]// 庆祝武伯伦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91(6).
- [25]a. 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吴镇峰等. 陕西凤翔八旗屯秦国墓葬发掘简报[C]// 文物资料丛刊(第 3 辑).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0. b. 陕西省雍城考古队. 一九八一年凤翔八旗屯墓地发掘简报[J]. 考古与文物, 1986(5). c. 陕西省雍城考古队. 陕西凤翔八旗屯西沟道秦墓发掘简报[J]. 文博, 1986(3).
- [26]a. 雍城考古队. 凤翔县高庄战国秦墓发掘简报[J]. 文物, 1980(9). b. 雍城考古队吴镇峰. 陕西凤翔高庄秦墓地发掘简报[J]. 考古与文物, 1981(1).
- [27]雍城考古队. 陕西凤翔西村战国秦墓发掘简报[J]. 考古与文物, 1986(1).
- [28]田亚岐, 王保平. 凤翔南指挥两座小型秦墓的清理[J]. 考古与文物, 1987(6).
- [29]凤翔县博物馆. 凤翔上郭店秦墓发掘简报[J]. 考古与文物, 2006(1).
- [30]a.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凤翔黄家庄秦墓发掘简报[J]. 考古与文物, 2002(先秦考古增刊). b. 王志友. 凤翔黄家庄秦墓发掘的一点收获[C]// 秦文化论丛(第八集).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1.
- [31]a. 田亚岐等. 陕西凤翔孙家南头周秦墓地发掘取得重大收获[N]. 中国文物报, 2004-9-8. b. 陈靓, 田亚岐. 陕西凤翔孙家南头秦墓人骨的种系研究[C]// 西部考古(第 3 辑).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8.
- [32]韩伟. 略论陕西春秋战国秦墓[J]. 考古与文物, 1981(1).
- [33]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雍城工作站. 凤翔邓家崖秦墓发掘简报[J]. 考古与文物, 1991(2).
- [34]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宝鸡市考古研究所, 宝鸡先秦陵园博物馆. 凤翔六道村战国秦墓发掘简报[J]. 文博, 2013(2).
- [35]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宝鸡市考古研究所等. 陕西凤翔西白村秦汉墓葬发掘简报[J]. 文博, 2010(4).
- [36]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宝鸡市考古研究所, 凤翔县博物馆. 陕西凤翔孙家南头西汉仓储建筑遗址发掘简报[J]. 考古, 2005(7).
- [37]a. 杨宽. 中国古代都城置都研究[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b. 徐卫民. 秦都城研究[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9. c. 尚志儒, 赵从苍. 秦都雍城布局与结构探讨[C]// 考古学研究.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93. d. 杨东晨, 杨建国. 秦朝都城的布局与方向[J]. 咸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4(5).
- [38]a. 马世之. 关于春秋战国城郭探讨[J]. 考古与文物, 1981(4). b. 李自智. 略论中国古代都城的城郭制[J]. 考古与文物, 1998(2).

(责任编辑 谭青枝)